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荆学民

作为国家与社会
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下的探讨

苏 颖◎著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荆学民



作为国家与社会 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下的探讨

苏 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下的探讨 / 苏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61-7849-2

I. ①作… II. ①苏… III. ①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20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
策略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书为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创新团队（政治传播）研究成果

编 委 会

丛书主编 荆学民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文刚	冯春凤	刘小燕	孙英春
苏 颖	李 智	李彦冰	张晓芒
荆学民	施惠玲	姜 飞	唐远清

总序

荆学民

这套被命名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丛书，是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批准文号：11&ZD075）的研究成果。丛书的著作者，基本上是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成员。

对我们政治传播研究团队来说，2011年是一个与我们很有“机缘”的年份。因为，自2008年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政治传播研究所并在硕士、博士层面设置政治传播招生方向而开始铺开的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到了2011年，我认为“国家层面”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诉求即将来临。果然，就在这一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次以“重大招标课题”形态抛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橄榄枝”。机会总是对“有准备者”而来，我们一举中标，开始了“国家作文”意义和层面上的政治传播研究。

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当时课题答辩时，我“诉苦”说：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这样的题目来招标，又是“世界眼光”，又是“中国特色”，又是“战略”、又是“策略”，着力点太多，不容易做好。之后，专家组显然采纳了我的建议，把“战略”去掉了。按理说，“战略”去掉了，研究的难度就降低了，但是，在之后的研究中我却感到，很多的问题仍然需要提到“战略”的高度。

作为课题首席专家，当然必须对这个课题研究的“突破点”和“着力点”有准确的自觉和相应的驾驭。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我们的研究论文《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这是该刊首次发表此类性质的文章。在一次与该刊领导与编辑的谈话中，他们请我最简练地说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我说：第一，中国的政治传播不同于西方政治竞选生态中以媒介为中心的专业性“政治操弄”，因而，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对我们

中国没有可复制性；第二，在中国，政治传播基本是政治宣传，因而对政治宣传研究的难度就是对政治传播研究的难度，有多难，你们懂的。

在这篇序言中，我有责任从严谨的理论研究角度，对这种通俗的表达做出进一步的诠释。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传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共同体的不同政治文明中，有着不同形态的政治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人类的政治文明经过不断地砥砺而走向融合。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不同形态的政治传播也日渐焕新，彰显特色。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此，建构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则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既需要研究一些满足于政治传播实践需要的策略，更需要对其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政治传播在西方竞选性政治的国家中比较普遍，在中国，政治传播意识越来越被自觉，政治传播理论越来越被重视，一定层面的政治传播活动也在逐步展开。但是，在理论上对于政治传播的理解和研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分歧还是比较大的。这与人们从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的视角来界定和研究政治传播有直接的关系。

广义的政治传播，把政治传播视为“古而有之”的政治活动，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的政治就有了人类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政治生活，成为人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种运行机制，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政治过程就是政治传播过程。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中西方理论界对从西方古希腊时期、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至当代的政治传播，进行了系统地探索和研究。现在的态势是：“在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传统（包括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影响下，政治传播研究的关注范围大为拓宽，因此，界定政治传播的范畴已成为一项越发困难的工作。”^①

^① [美]道格拉斯·M.麦克劳德等：《政治传播效果范畴的再审视》，参见詹宁斯·布莱恩特等《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1页。

狭义的政治传播，把政治传播理解为“利用媒介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活动，概括起来有四个要点：第一，人类政治进入成熟的竞选政治阶段；第二，传播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第三，大众媒介相对独立成为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第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变量在竞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狭义的政治传播，把政治传播视为一种依赖媒介的专业化的政治操作。这样的政治传播是意识形态、权力、资本、媒介多重因素交织和博弈的“政治交响曲”。这种政治传播没有悠久的历史，完全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而且也只是现代政治运行中的行为之一。

显而易见，现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多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政治传播。一些西方学者呼吁：“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政治传播的范畴必须被缩小。一般来讲，政治传播指的是符号与讯息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一般公众和新闻媒介间的交换。新闻媒介既是政治系统的产物，又反作用于政治系统。这些交换过程的结果涉及权力的巩固或变更。……对政治传播的界定会进一步被缩小为集中关注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通过它们的新闻内容进行的符号与讯息的交换。”^① 在我们中国，很多人也是从这种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政治传播的，因而，热衷于对西方政治传播理论进行翻译和评介的所谓“本土化”研究，已然是我国目前政治传播研究的主体形态。

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机制和生态有其区别于西方竞选行政政治的特殊性，尤其是媒体媒介的性质、地位、机制、作用等，与西方国家也有根本的区别，因而西方哪种基于狭义政治传播范畴的政治传播理论，虽然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但是，它很难解释现实的中国政治，更难引导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因而，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和研究，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从广义角度把政治传播理解为“政治信息的流动、扩散、接受、认同、内化”过程^②，才能逻辑地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宣传，才能把现在仍然是中国政治传播主体形态的政治宣传，置放于更广阔政治视野、更深刻的政治内涵中，从主体、对象、内容、途径、

^① [美]道格拉斯·M.麦克劳德等：《政治传播效果范畴的再审视》，参见詹宁斯·布莱恩特等《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② 这是我对政治传播的界定，参见拙作《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新华文摘》，2009年第21期。

方法、效果等各个环节和层面上，进行总结、反思、比较和研究。只有这样的政治传播理论，才可能适合解释中国政治文明，才可能具有中国特色，才可能有效引导中国政治传播实践。

鉴于以上理解，这套研究丛书，努力从中国背景、中国立场、中国观点、中国问题、中国逻辑、中国表述、中国语势，在理论和对策（策略）两个层面展开对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研究。当然，由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知识结构、学科背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其中理论与对策的结合方式与表达风格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也是“主编”并不能完全左右、也不应该左右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差异才可能是百花齐放的。

需要说明的是，丛书的选题与申报时的选题有一定的微调，有些原来列入选题，但是，由于在具体的研究中似有重复或者研究者的困难而不能提交研究成果；有些原来申报时并未列入选题，但是成果成熟且意义重大而被及时出版。好在是，我们这套丛书是开放性的，会一批一批出下去。以后相关研究成果只要符合我们的要求可以及时补充进来。

说句实话，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我们主观上是很努力的，但是，对这样的研究话题，努力与质量高低并不必然是“正向”关系，还是由读者来判断吧。

写于北京东湖寓所
2014年3月14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意义	(1)
一 现实意义：政治发展路径下的当代中国政治传播	(1)
二 理论意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与“政治传播 研究”的理论联结	(5)
第二节 研究综述	(8)
一 政治传播研究的范畴	(8)
二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内容及演变	(11)
三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领域与重点	(24)
四 国家与社会沟通视角下政治传播研究	(28)
第三节 概念界定	(31)
一 多元行动者的“政治传播”	(31)
二 “国家与社会的沟通”	(41)

上编 作为参照物的基本理论

第一章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解中西政治传播差异	(51)
第一节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解西方政治传播	(52)
一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领域与界限	(52)
二 结构自主的公共领域：西方政治传播的活动领域	(57)
第二节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解“中国特色”政治传播	(61)
一 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的逻辑	(61)
二 以增强国家能力为目标的政治传播	(66)

第三节 “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的提出	(70)
一 “作为国家与社会方式的政治传播”的行动者	(71)
二 “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的应用领域	(74)
小结	(79)
第二章 从系统论视角到国家与社会沟通视角：政治传播	
结构再解读	(81)
第一节 政治传播结构的自主性	(84)
第二节 国家维度的政治传播结构	(86)
一 政治传播输出结构	(87)
二 作为正式制度结构的政治传播输入结构	(88)
三 输入与输出的转换	(88)
第三节 媒介维度的政治传播结构	(89)
一 媒体	(89)
二 组织传播通道	(91)
第四节 社会维度的政治传播结构	(92)
一 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二级链条的舆论领袖	(93)
二 作为自主力量的公众舆论	(95)
小结	(98)
第三章 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模型	(100)
第一节 多层国家议题设置	(100)
一 多层国家：执政者、政体和政治共同体	(101)
二 议题设置：质料、形式	(103)
第二节 多元社会共识聚合	(105)
一 基于多层国家的多元社会共识聚合的可能性	(106)
二 聚合动因：交易、说服、权威	(109)
第三节 政治传播：国家致力于谋求社会支持	(112)
一 政治传播的目标：谋求支持	(112)
二 “专营市场”和“共同偏好”：当代西方政治传播 谋求的两种支持	(113)
三 现代政治合法性：当代西方政治传播支持谋求模式 的基础	(115)

四 从抽象的公民认可到具象的程序—法理：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实现途径	(126)
第四节 基于“多层国家”与多元共识的政治传播模型	(129)
一 执政者层次：在异见中谋求支持	(130)
二 政体层次：建立或巩固政治合法性	(131)
三 政治共同体层次：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	(131)
小结	(132)

下编 作为对象的中国经验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系统总览	(135)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影响	(135)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沟通视角下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结构	(138)
第三节 审查与开放并存：中国政治传播的结构自主性	(141)
第五章 国家维度的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结构	(145)
第一节 对内政治传播机构及运作	(145)
一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	(146)
二 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地方宣传部门	(150)
三 政治传播的协同一会同输出机构	(153)
四 政治传播的管理与审查机构	(154)
第二节 对外政治传播机构及运作	(155)
小结 封闭冲突的共识输出	(158)
第六章 媒介维度的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结构	(161)
第一节 从国家到社会何以可能？	
——高度组织化的中国政治传播	(161)
一 政治系统内政治意图的组织传播	(162)
二 通过组织实现的政治社会化	(166)
第二节 喉舌，抑或公关平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中媒体角色的调试	(170)
一 制度化媒体、非制度化媒体：对中国媒体分类的讨论	(171)

二	党和政府的喉舌	(174)
三	政党公关平台	(180)
小结	不被信任、专业化不足的媒介系统	(186)
第七章	社会维度的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结构	(188)
第一节 失灵的舆论领袖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中介链条的断裂		(188)
一	文化取向的“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二级传播模式	(189)
二	“党—国家—党员—群众”的二级组织传播模式	(193)
三	当前中国政治传播过程中舆论领袖的失灵	(197)
第二节 作为自主性力量的公众舆论：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推动力		
	(200)	
一	舆情舆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新尝试	(201)
二	中国民意输入再审视	(209)
三	公众舆论：从反馈要素到自主性力量	(211)
小结	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转型的契机	(213)
第八章	政治发展路径下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	(216)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谋求模式及其困境		
	(216)	
一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实用主义”转向	(217)
二	以意识形态和执政绩效为资源的合法性谋求困境	(219)
第二节 当代中国合法性谋求途径的改变		
	(222)	
一	以“程序—法理”为中心资源谋求合法性的提出	(223)
二	以“程序—法理”为中心的政治合法性模式建构	(224)
三	以“程序—法理”为中心的政治合法性对政治发展的支持	(231)
第三节 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转型		
	(234)	
一	政体层次：谋求“程序—法理”合法性	(234)
二	执政者层次：在公民异见中谋求支持	(237)
三	共同体层次：国家与社会互动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	(238)

结 论	(240)
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69)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本书拟将政治传播看作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方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意志贯彻，从而探讨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如何通过政治传播增强国家谋求社会支持的能力，以弥补政治调整过程中的权威不足。从现实意义来看，本书拟探讨这一思路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即探讨中国在政治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传播正在扮演以及应该扮演的角色，更期待政治传播也成为促进中国政治发展与转型的推动力之一；从理论意义来看，这一思路试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与“政治传播研究”之间做一个理论上的联结。

一 现实意义：政治发展路径下的当代中国政治传播

就世界范围来看，政治传播呈现出“全球趋同化”（Global Convergence）^①的趋势，具体来说，政治传播的专业性的规范和守则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分享和实践。更进一步说，这些被采用做法都最先发生、发展于美国，以至于一些学者直接将政治传播的“趋同化”描述为政治传播的

^① Daniel C. Hallin and Paolo Mancini, *America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Understanding the Convergence of Media System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Frank Esser and Barbara Pfetsch, ed.,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丹尼尔·C. 哈林保罗·曼奇尼：《比较媒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页。

“美国化”（*Americanization*）^①。与政治传播“趋同化”趋势并行的，是学者对政治传播形态“多样性”（Diversity）的关注。尽管诸多规范正在趋同，但是各个国家政治传播的形态又根植于该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而各个国家政治传播的具体形态并不完全一致——以上学者的总结对本研究不无裨益。

政治传播的“趋同化”研究向我们展示了某种具备鲜明特征的政治传播模式（Pattern）^②：在这种模式当中，政治传播主要应用于政治竞选领域，它依赖于专业的顾问团队，运用商业化媒体的逻辑，力图影响民意，从而为政治候选人谋取选票。这个过程的直接结果，是确立某届执政者，执政者由选票产生，因而具有合法性；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代议制民主的运作过程，因而，它不仅仅产生了当局执政者的合法性，而且为这种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此，我们能够清晰认识到，政治传播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模式的反映——如果说全球的政治传播模式正在“美国化”，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全球的政治模式正在“美国化”。“美国式政治竞选方式被采用，可能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更普遍的过程，这一过程改变了许多社会，而这种改变很难归因于一个单一的原因，并且这种改变远超出政治和传播的范畴。……我们将这种更一般的过程称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③“美国化”的政治运作是“现代化”政治运作的集中体现。这并不是说“美国化”是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而是说，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环境、地理等条件）产生的美国政体运作，以及为了维持这种政体运作而运用的政治传播始终走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前沿。美国的政治传播，就像世界政治传播的一个奢华的“橱窗”，骄傲地向世界展示着它们最先进的政治竞选技术——不论如何，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技术。

① Ralph Negrine and Stylianos Papathanassopoulos, *The "Americaniz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Critique*,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 no. 2, (1996).

② David L. Swanson et al., *Politic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 :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Innovations in Electoral Campaigning and Their Consequences*, Westport, Conn. ; London: Praeger, 1996, p. 247.

③ Ibid. , p. 6.

政治传播的“多样性”研究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推进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当前中国的政治传播与正在全球趋同化的政治传播模式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最明显的一点是，竞选和民意调查并不是中国政治传播运作中的主要成分。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在狭义范围内理解政治传播，中国根本没有政治传播——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国当然有政治传播，而且政治传播与中国政治系统的运作息息相关。中国政治传播的调整与转型已经历经一段时间。如果说，“美国化”的政治传播模式被采用反映着“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中国政治传播多年来的调整和转型，实际上也反映着一个更广泛也更一般化的政治模式调整与转型的过程，本书将这一过程称为“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政治发展”一词在许多文章中等同于“政治现代化”的含义，不过本书希望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政治现代化”逐渐“模式化”的今天，各国的政治发展路径，尤其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① 国家向现代政治转型之路，能否在“现代化模式”之外再保留一部分“模式之外”的空间？基于以上思路，本书将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之下，探讨中国政治传播的历程、特征和未来。

在中国，政治传播与政治系统的运作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命运与共的。当前中国政治系统在确立之初（新中国成立之初），其合法性的基础就是意识形态宣传。“社会主义价值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合法性建构手段的宣传也就确立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战略。”^② 不过，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这种政治传播方式的有效性正在下降。而且，这样的统治模式对系统更新造成了阻碍：因为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结合得过于紧密，但凡政治结构的调整，势必触及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造成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导致国家权威不足，又可能酿成社会秩序的动

^①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是美国学者列维对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的分类，中国学者孙立平曾对这两个概念做过很好的界定，参见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55—70页。

^② 张燚：《宣传：政党领导的合法性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博士论文，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2010年版，第116页。